

中国 社情报告

· 领导决策信息年度报告 ·

ZHONGGUO

SHEQING

BAOGAO

连玉明 武建忠◎主编

构筑推进社会和谐的共同愿景

寻求实现科学发展的动力源泉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中国 社情报告

· 领导决策信息年度报告 ·

连玉明 武建忠◎主编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情报告 / 连玉明, 武建忠主编.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0221-548-1

I. 中… II. ①连…②武… III. 社会生活 - 研究报告 - 中国 IV. 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3512 号

书 名: 中国社情报告

出 版 人: 宋灵恩

作 者: 连玉明 武建忠

出版发行: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邮政编码: 100044

发行热线: (010)68320825 68320484

传 真: (010)68320634

邮购热线: (010)88361317

网 址: www.cmepub.com.cn

电子邮箱: zgsdjj@hotmail.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368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1-548-1

定 价: 46.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部分 01

变化：群体性事件频发暴露社会断裂危机

- 1 转型期社会结构失衡的严重性 ⊙ ⊙ 002
- 2 新社会阶层的出现对中国提出新挑战 ⊙ ⊙ 007
- 3 三大案例警示优化基层社会生态治理刻不容缓 ⊙ ⊙ 010
 - 一些官员作风已经不能拿“腐败”来形容了 ⊙ ⊙ 011
 - 部分官员已与黑恶势力结成“利益联盟” ⊙ ⊙ 012
 - 社会对财富与权力可能结合高度敏感 ⊙ ⊙ 013
- 4 推进基层舆论生态再造势在必行 ⊙ ⊙ 014
 - 网络显现“第一媒体”之势，与网民交流渐成常态 ⊙ ⊙ 014
 - 习惯于“宣传部把关”，基层干部不适应网络舆论监督 ⊙ ⊙ 016
 - 建立网络民意处理机制，推进基层舆论生态改革势在必行 ⊙ ⊙ 018
- 5 增大草根阶层话语权防止社会断裂 ⊙ ⊙ 019
- 6 构建畅通的民意表达和诉求的长效机制 ⊙ ⊙ 021
 - 由“自选动作”变“规定动作” ⊙ ⊙ 021
 - 变“上访”为“下访” ⊙ ⊙ 023
 - 从事后“救火”到排查隐患 ⊙ ⊙ 025
- 7 警惕基层选举暴力冲突事件“扩大化和复杂化” ⊙ ⊙ 027
 - 引发暴力冲突事件的多发因素——贿选 ⊙ ⊙ 029
 - 干预基层选举的复杂因素——地方恶势力 ⊙ ⊙ 032
 - 影响农村选举的根本因素——村干部腐化 ⊙ ⊙ 033

第二部分 02

考验：如何消化突然增加的 2528 万贫困人口

1 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初步呈现 00 038

整村推进、行业扶贫加快致富步伐 00 040

区域扶贫彰显互助合作 00 043

社会扶贫政策落实以人为本 00 045

如何消化突然增加的 2528 万贫困人口 00 048

2 “四管”齐下推进城乡一体化 00 055

城乡规划：打好发展基础 00 055

户籍改革：打破城乡壁垒 00 057

服务均等：共享改革成果 00 058

产业培植：壮大城乡经济 00 061

新农村建设六大领军人物 00 062

3 积极应对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就业挑战 00 072

看 7000 万返乡农民工如何就业 00 072

看 611 万高校毕业生如何就业 00 080

4 9000 亿住房保障投资拉开“公屋时代”大幕 00 088

廉租住房配建制逐步确立 00 090

充分考虑低收入家庭困难 00 092

经济适用住房投资规模将继续扩大 00 094

5 医改进行时：世界性难题的中国解答 00 101

让人们不再喊“看病贵” 00 103

让老百姓有廉价药可用 00 104

让社区医院成为百姓健康“守门人” 〇〇 105

让每个公民享受同样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〇〇 106

让公立医院成为改革的排头兵 〇〇 107

6 新农合试点大省的典型经验 〇〇 109

黑龙江：跻身全国新农合重点联系省 〇〇 111

四川：出新招推进新农合，进一步实现制度优化 〇〇 112

湖北：新农合“参合”农民报销上限将增至4万元 〇〇 113

浙江：新农合医疗加大力度，2009年人均140元以上 〇〇 114

吉林：超过96%在乡农业人口参加新农合 〇〇 115

云南：14家省级医院纳入新农合 〇〇 116

7 让更多群众受益才是真正的“民生工程” 〇〇 118

各地“民生工程”资金投入力度加大 〇〇 119

项目扩容，重点倾向农村 〇〇 121

第三部分 03

底线：没有安全一切都无从谈起

1 政府工作报告谈安全 〇〇 128

建立食品安全长效机制迫在眉睫 〇〇 129

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〇〇 132

2 2009，农产品质量安全整治执法年 〇〇 133

生鲜乳专项整治行动 〇〇 136

饲料专项整治行动 〇〇 137

水产品专项整治行动 〇〇 138

“三品”专项整治行动 ○○ 138

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 ○○ 139

3 社会稳定——2009 年的第一要务 ○○ 142

“保增长”是“保稳定”的前提 ○○ 143

“保民生”是“保稳定”的基础 ○○ 144

“促和谐”与“保稳定”相辅相成 ○○ 148

4 山西、湖南等五省应对金融危机的新思维 ○○ 150

山西：转型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 ○○ 150

湖南：率先提出“弯道超车” ○○ 154

湖北：全力推行“能力建设年” ○○ 155

福建：继续坚持“四个重在” ○○ 157

四川：全面推进“两个加快” ○○ 158

5 平安重庆：建设全国首个安全保障型城市 ○○ 159

建设全国首个安全保障型城市 ○○ 161

做好“六个保障”扎实推进“平安重庆”建设 ○○ 164

全市总动员，二十项重点工作次第展开 ○○ 165

对违法违纪实行“零容忍” ○○ 166

6 筑牢基层安全生态体系急不可待 ○○ 167

株洲“5·17”高架桥坍塌警示：魔鬼就在细节中 ○○ 168

成都“6·5”公交燃烧事件反省：城市公交最脆弱的那根神经 ○○ 169

武隆“6·5”山体垮塌事故警示：治理乏力问题必须遏制 ○○ 170

广东镇街综治信访维稳新格局是怎样构建的 ○○ 172

7 长安杯：“平安城市”建设的角逐很激烈 ○○ 181

烟台：“五连冠”来之不易 ○○ 182

南通：12 年炼就“大调解”机制 ○○ 183

西安：12 年努力捧回“长安杯” ○○ 185

秦皇岛：“四优”之路 ○○ 187

中山市：全力构建齐抓共管的“大综治”格局 ○○ 187

天津市和平区：平安建设保长安，综合治理谱新篇 ○○ 189

第四部分 04

行动：打造“透明政府”在路上

1 2008 官场整肃反思 ○○ 194

“问责风暴”规模空前：问责将制度化、法律化 ○○ 194

问责将制度化、法律化 ○○ 195

严惩贪腐：要抓住三个“关节点” ○○ 196

贪官“外逃”再引关注：根本解决之道须从制度层面反思 ○○ 199

2 做好地方机构改革加减法，打造有限责任政府 ○○ 201

3 加速！加速！新一轮政府效能大竞赛 ○○ 207

天津：“文山会海”大瘦身，行政审批大提速 ○○ 207

广州：七举措改进机关作风，行批事项将再精简一半 ○○ 209

三亚：出台系列办法加强行政效能，看谁还敢脸难看事难办 ○○ 211

柳州：开展“政务服务年”活动，行政审批要提速 70% ○○ 213

资阳：率先在四川省开展投资项目并联审批试点 ○○ 213

石家庄：开通房地产审批绿色通道 ○○ 214

4 “不按套路”出题的公务员考试 ○○ 215

内容紧跟时事政治，体现对时代的关切 ○○ 216

命题切中社会热点，众说纷纭见真知 ○○ 217

各种考题考查多种能力 ○○ 219

公务员考试中的偏题、怪题和难题 ○○ 221

5 从河南灵宝“王帅事件”看政府如何对待诽谤 ○○ 223

从政府官员角度看：善于解释，“诽谤”将止于真相 ○○ 227

从普通公民角度看：言者无罪，更需言者有物 ○○ 229

从法治的角度看：保障权利，防止权力滥用 ○○ 230

6 “法制城市”创建：无锡、成都等走在最前列 ○○ 232

无锡：率先启动法治城市建设 ○○ 233

成都：测评体系细化八大方面 77 项内容 ○○ 235

广州：2014 年基本实现法治政府 ○○ 238

南昌：突出六项工作财政予以保障 ○○ 239

昆明：2014 年基本实现四个“生活”法治化 ○○ 240

7 固本强基：聚焦基层百万官员大轮训 ○○ 241

县委书记轮训：提高“四种能力”、履行好“五抓职责” ○○ 242

县纪委书记轮训：提升县级纪委的执行力 ○○ 244

公检法系统轮训：提能力、促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 245

8 打造“透明政府”在路上 ○○ 249

杭州：政府从闭门开会到网络视频公开直播，

“开放式决策”让民主领跑民生 ○○ 249

南京：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实现三大突破 ○○ 251

宿迁：全国官员博客最集中的城市 ○○ 253

昆明：公布领导干部 7355 部工作电话，

168 名责任人不接听电话被通报批评 ○○ 255

邯郸：行政权力运行实现全程动态公开 ○○ 255

9 “60 后”高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257

“60 后”高官的成功之路 ○○ 257

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解读 ○○ 263

第一部分

变化：群体性事件频发暴露社会断裂危机

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在人均 GDP 由 1000 美元向 3000 美元过渡的时期，往往是一个社会矛盾的突显期。中国 2003 年末实现人均 GDP 超过 1000 美元，目前正处于这个社会发展阶段。在我国，近一些年份群体性事件呈现出加速上升的趋势。据 2005 年《社会蓝皮书》报告，从 1993 年至 2003 年 10 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年平均增长 17%，由 1994 年的 1 万起增加到 2003 年的 6 万起，增长 5 倍；规模不断扩大，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数年均增长 12%，由 73 万多人增加到 307 万多人，其中百人以上的由 1400 起增加到 7000 多起，增长 4 倍……冲击党政机关的事件逐年上升，从 2000 年的 2700 起，到 2003 年的 3700 起，仅 2003 年发生堵公路、卧轨、拦火车的事件就达 3100 起。

1

转型期社会结构失衡的严重性

针对日益增多的群体性事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从2006年3月至7月在全国进行了一次“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全国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发现，有67.9%的人认为当前我国不同群体之间存在一定冲突，只有16.3%的人认为“没有冲突”；有38.6%的人认为我国社会群体利益矛盾肯定会激化，有22.4%的人态度犹疑，说不清是否可能激化。这些结果表明，原本可能是潜在的群体利益矛盾，已经显化为被意识到的社会利益矛盾，社会利益矛盾激化的趋势也相当明显。有关专家指出，群体性事件形成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权力分配过度倾斜是导致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基础。权力是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社会稀缺资源。社会学家布劳认为，当代社会的权力结构由底层、中层和上层构成，他认为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就意味着某种利益的冲突。尽管底层阶级中的个人无权力可言，但是这不意味着低层阶级作为一个群体没有任何力量，当人数众多的底层以某种方式团结起来，实现马克思所宣称的“自为阶级”的时候，其爆发出来的力量足可以变动整个社会的基础结构和既有秩序。

改革的实质是权力的重新分配，是利益关系的全面调整。中国社会的改革使各种形式的主要负责人责任制得到了推行。毫无疑问，负责人责任制强化了负责人的责任意识和积极性，推动了社会的整体发展。但与此同时，负责人责任制也特别容易将负责人的权力推向顶峰，推向一个难以制约的境界，造成不少负责人权力欲望膨胀；另一方面，作为一般管理人员，一般员工，特别是广大农民，他们容易处于无权境界，致使其权力的“相对剥夺感”强烈。我们认为这是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基础。

其次，利益诉求渠道的缺失促成民众非正常表达。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会随着利益的分化而增长，如果其政治体系无法给个人或团体的政治参与提供渠道，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政治行为就有可能冲破社会秩序，给社会带来不稳定。

从社会设置上看，中国社会成员的利益表达途径比西方国家更加多样化，我们有信访制度、人民代表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纪检制度等，此外还有行政领导接待制度，如市长接待

日、书记信箱、市长热线等，这些都是群众利益表达的正常渠道。但是，当一些地区，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底层群体的利益受损时，所有这些渠道均表现出梗阻现象，人民群众无处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民众“无力表达”、“表达无门”、“表达无用”的现象比较突出。这说明，实际运作中的底层民众直接的利益表达通道是缺失的。

第三，转型期社会结构失衡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认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导致社会结构失衡甚至断裂，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他认为，中国社会正面临着社会结构失衡、断裂的危险，全球化、中国社会改革的结果导致部分社会成员被置于主流社会之外，他们的社会挫折感、剥夺感非常强烈，他们的生活状况一直徘徊在社会底层边缘，不少下岗职工的生活相对水平随着改革的推进反而逐步下降。另一方面，社会安全保障网的建设严重滞后，政府无力满足来自不同群体的正当要求。在此种情形下，思想意识混乱、价值观念偏离、利益要求抗争、心理归属失落等各种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这样的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就特别容易引发群体性越轨行为。

而另据中国人民大学公布的社会研究报告《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更认为，目前中国底层群体大约有1.4亿~1.6亿人。这样一个庞大群体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如果他们感受不到改革开放的“雨露阳光”，无法跟上社会发展的主流，甚至被甩到主流社会之外，其生活境况极其艰难，心态极其脆弱。一旦诱发因素出现，爆发群体性事件的几率就会加强。

第四，底层社会成员相对剥夺感增强是群体性事件形成的诱发因素。所谓相对剥夺感，是指社会中的个体将自己的地位与境遇和其他类别和地位的人做了比较后，在心理上产生的一种落寞的情绪感受，它通常与公平、不公平的评价相关联。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认为，社会是一个由上中下阶层组成的不平等系统，由于竞争的残酷性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不平等系统中的下层成员往往会怀疑现存稀缺资源分配体系的合法性，当怀疑的强度足够大时，他们体验到的相对剥夺感就会越强烈，他们就越有可能联合起来斗争。科塞指出，对社会体制的合法性期望和受阻期望是剥夺感的中介变量。所谓合法性期望，是指社会成员认为现行体制应该保证他们在一定投入后可以提高其社会地位、生活水平和改变社会角色。当期望突然受阻，人们的剥夺感就会增强，不满情绪就会增加，此时，对抗性的群体行为也就容易滋生。

第五，落后、僵硬的社会控制机制容易刺激群体性事件发生。中国社会处于转型过程中，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性质日益分化，伴随着这种分化现象，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矛盾。这在客观上要求社会控制方式也必须是多元的、系统的。但是，中国不少欠发达地区在社会控制方式上甚至有传统化的倾向。政府管理机关在对待、处理社会矛盾时，忽略了社会成员日益觉醒的权利意识，不少人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家长作风十足。他们在工作策略上不能够将矛盾各方置于平等地位，在工作方法上不能够以现有法律、法规以及当地习俗为准绳。当各种问题和矛盾相互交错、相互影响、互动加速时，落后、僵硬的控制机制反而还会极大地促成群体事件的发生和发展。

第六，信息屏蔽是酝酿群体性事件的温床。我们的社会实际上存在一种信息屏蔽机制。这种机制具体表现在，“能捂就捂”的信息控制逻辑；“这是极个别现象”的信息解释逻辑；不危害稳定、不向公众公开的信息反应逻辑。因此，许多信息在这样的“信息三部曲”下面，被各方按照自己的意愿、期待和理解而任意制造和扭曲，客观真实的信息反而失去其价值。如瓮安事件中公安部门有关尸检的结论就反复遭到质疑，这除了政府部门本身在日常工作中不注意诚信体系的建设外，与矛盾各方各自按照自己的信息屏蔽机制解读信息有很大关系。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各方均会按照自己的期待而行动，如提出过高的赔偿要求，而忽略自己行动的合法性。因此，信息屏蔽其实是群体事件酝酿的温床。

Yulun Jujiao

舆论聚焦 ■ ■ ■

“财富集中度”之争

2009年6月，关于“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91%”的信息和议论在网上广为流传。与此同时，传统媒体也陆续推出以此数据为由头的时评、专论，引起广泛关注。一时间，关于中国财富集中度的讨论甚为热烈。

那么，这些数据从何而来？权威部门是否发布过这样的调查报告？这样的信息为何能引起如此高的关注度？

根据人民网2009年8月5日发表的题为《一组虚假数据是如何在网上网下以讹传讹的？——关于“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91%”的新闻调查》的文章，通过调查揭开数据背后的真相。

2009年6月25日，《时代周报》刊发了记者韩洪刚采写的报道，报道在导语中称：“在日前召开的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上，中国财富的‘集中度’正在受到政协常委和委员的热切关注。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韩洪刚称：他“查阅了几组权威数据显示，中国财富的确在以全球最快的速度流入富人钱包。”随后，该记者在报道中写道：“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

这篇报道刊发后立刻被众多网站、论坛、博客，以及传统媒体转载、转贴。许多媒体和网友在转载、转贴的时候，将数据来源“简化”成蔡继明的发言，将这位曾因倡导假日改革成为

媒体焦点的全国政协委员再次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人民网记者几经周折，于2009年7月31日终于联系上了《时代周报》记者韩洪刚。他承认，这段数据不是引自蔡继明委员的发言，而是引自互联网上转载的某位国内经济学者2006年写的一篇文章。

随后，人民网记者又与该经济学者联系核实。该学者称此数据引自当年的互联网，他说：“当时网上（这组数据）非常流行”。

处在舆论旋涡中的蔡继明近来不胜其扰，他曾在2009年7月11日通过个人博客发布澄清声明，但收效甚微。这组数据仍在继续传播和热议。

2009年7月31日下午，蔡继明接受了人民网记者的采访。他说，事实上，他在全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专题讨论会发言时，只是提到“国外一家研究机构估计，中国0.4%的最富裕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并没有指明是哪一家研究机构，更没有说是中国权威部门的报告。《时代周报》记者在没有对他进行采访的前提下，写了这则报道。《时代周报》并未说明后一个数据是他所说，但其他媒体再次引用《时代周报》数据时，就变成了：“蔡继明委员在近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援引一份由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等部门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

蔡继明强调：“我对媒体这种乱引数据，误会当事者本意的做法感到非常反感。媒体报道应本着客观、真实、准确的原则，而不是恶意炒作。”

为了增加这组所谓数据的可信度，一些媒体在报道、转载、评论这些信息和数据时，一再强调“中国权威部门”、“全国政协委员”等关键词，可假的终究是假的。不仅蔡继明委员出面澄清事实，该“报告”列举的权威部门也纷纷通过记者正式辟谣。

中宣部政研室有关负责人明确表示，“我室从未与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联合作过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研，我室也从未进行过这方面的专题调研，更未起草过这方面的调查报告，在已有的调研报告中也未引用过这些数据。”

有媒体报道称这组数字最早来自于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课题。该课题负责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对此坚决否认，连称荒唐！

他说：“‘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的91%’，是不可信的，因为无法统计，并且比例数还精确到个位数，很荒唐！至于说这一数据来源于‘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课题，更是荒唐！我们的课题完成于2004年，而统计数据说的是‘截至2006年3月’，这怎么可能？”

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相关负责人则告诉记者，根本没有这份报告，这组数据是假的，两年前曾在网上炒作过，最早来自海外某刊物。

人民网记者通过互联网搜索，发现早在2006年10月19日，境外星岛环球网就刊发了题为“官方报告：中国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的报道。报道称：“官方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披露：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上都

是高干子弟。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有 2900 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两万多亿。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近日出炉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详细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这不知是不是网上最早出现的此虚假报告的来源，但此篇报道被转载、引用的频率很高。

该记者还搜索到了英文时事杂志《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007 年第 4 期上的一篇文章，文中也提到了这些数字。文章原文为：“Article after article pores over the potential economic reasons for the increase in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We ignore the fact that of the 3,220 Chinese citizens with a personal wealth of 100 million yuan (\$ 13 million) or more, 2,932 are children of high-level cadres.”

翻译成中文，大意为“一篇又一篇文章在研讨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潜在经济原因。但是，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有 3220 个中国人拥有财富超过 1 亿元，2932 人是高干子女”。人民网记者发现，该文章引用这组数据时并未注明数据来源和统计时间。

就是这样一个被相关部门断定为造假的报告，就是这样一组语焉不详的数据，却在境内外许多网站、论坛上广泛流传，且“版本”不尽相同。有网友在此类帖文下跟帖置疑：“我希望通过数据考证来说话，不管原作者出于何种想法或意识形态写了这篇文章，我认为错误的事实都是无法支持的。”

至此，引发轩然大波的“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 91%”经过权威机构的鉴定，数据是拼凑嫁接，信息是以讹传讹，“权威数据”不权威，中宣部、中央党校、国务院、中国社科院等相关部门纷纷辟谣。经过验证，不是出自蔡继明委员的发言，而是引自互联网上转载的某位国内经济学者 2006 年写的一篇文章，是不可信的，是很荒唐的。然而，就是这样一组经不起推敲的数据，何以能快速传播，以假乱真呢？有评论认为，

“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 91%”这则假报道，广泛传播、以假乱真，不仅仅反映出新闻媒体在管理上的漏洞，更凸显了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深层次社会问题。一位网友就明确表示：“网上传播的这些信息，包括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的比例等，其数字不一定很准确，但收入差距过大以及特权阶层掌握了过多的社会财富，却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说，对贫富差距加大的忧虑、对反腐败的期盼、对自己生存状态的不满，等等，都会成为促使大家关注、热议此类信息的原因。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熙瑞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就谈到了此类虚假信息传播背后的原因。他说，“这类虚假数据之所以在博客和论坛广为传播，大多是网民们的一种情绪宣泄，或者作为他们一种价值理念的传播。”他认为，尽管这种信息缺乏根据，但是导致此类信息如此广泛传播背后所隐藏的群众的某种不满情绪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中国网 2009 年 8 月 7 日发表署名吴龙贵的评论文章《为“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 91%”辟谣背后》认为，互联网时代，公共信息泥沙俱下，“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 91%”的以讹传讹，直接拷问的是媒体的新闻操守和职业素养。但同时，这背后的社会心理也十分值

得玩味。事实上，无论是恶意炒作，抑或是情绪宣泄，还是专家所用的专业术语“刻板印象”，那么多人愿意相信，并且主动去传播这一信息，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问题。

一方面，是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我国的基尼指数从新中国成立前的 0.16 上升到目前的 0.47，财富越来越集中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财富究竟到哪里去了？另一方面，则是源于财富的高度不透明。每年各类财富排行榜一公布，总是会引起公众的一片惊呼，因为上榜的富豪常有人们不熟悉甚至极为陌生的。特权、身份、背景，无疑是人们最为联想的关键词。再加上腐败现象的严重，权力通吃成为社会显规则，裸体做官，以及权力参股等事件不断发生，更进一步强化了权力与财富之间的联系。由此，公众给“官二代”贴上一个概念化的标签，其实有着极为强劲的内在逻辑。

没有财富透明，就没有财富清白。事实上，“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的 91%”虽然得以澄清，但很多公众马上就有了脱口而出的欲望：不是 91%，那么是多少？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说：“‘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的 91%’，是不可信的，因为无法统计”，与其说这是在论证传言的不可信，不如说它道出了传言之所以能够传播的根源。在一个公平有序的社会，财富不仅是可统计的，譬如消费情况、纳税情况，都可以显示一个人的财富状况，而且更重要的是，越是官员子女，就越要比普通公民有更高的财富透明度。在许多国家，子女财产和就业状况，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必须报备的内容之一。也唯有如此，才能证明一个人的财富清白，从而避免公众在权力与财富之间过度想象。

很明显，“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 91%”以讹传讹的背后，不仅表明财富伦理的难获认同，同时也是制度失范的一个表现。譬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提出已逾 22 年，但至今仍在“试点”中徘徊。正是由于正当的民意诉求得不到满足，人们才转而去信任那些“不确切”的信息。在这个意义上，仅仅只是澄清，似乎远远不够。

2

新社会阶层的出现对中国提出新挑战

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一样，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结构。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就曾指出，中国正在发生“千年未有之变局”。2006 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

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路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四个“深刻”，是对中国空前的社会变革的全面概括。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 2008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改革开放 3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主题发言时指出，中国的社会结构真正并实现历史性的大变局，是在 1978 年以后。改革开放以来，大大加快了中国由传统的农业、农村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转型，果断地实施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对原来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极大地推进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而社会转型的加快和成功，反过来又推进体制改革和转轨的深化和持续进行。这种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同时进行，互为动力，相互促进，正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功，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原因，而这也是中国当前产生了诸多经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原因。

这一系列深刻变革中，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最为引人注目——

1950 年代初期，中国实行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1950 年代中期通过城乡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形成了主要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组成的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也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格局，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民阶级分化了，工人阶级变化了，并产生了诸如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农民工等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一个与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初步形成，还正在发展之中。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中，社会中间阶层正在逐渐成长。从国际的历史经验看，现代化社会的阶层结构形态，一般都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结构。即拥有社会资源很多、社会地位很高的阶层和拥有社会资源很少、社会地位很低的阶层的规模都很小，而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足以过上小康生活乃至更高水平生活的社会中间阶层占大多数。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一个以专业技术人员、农业中的专业大户、自我雇佣者和中小企业主为主的社会中间阶层已经产生，并正在逐渐成长。据中国社科院有关课题组的测算，1999 年，中国的社会中间阶层占全国就业劳动者总数的 15% 左右，这些年来，发展得很快，平均每年增加约一个百分点，2007 年为 23% 左右。

按照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 2006 年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的说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组成。目前全国私营企业有 450 万家，投资人 1100 万，自由职业者约有 1000 万。据相关统计，新的社会阶层以及从业人员人数已超过 1.5 亿，约占总人口的 11.5%，掌握或管理着 10 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 1/3 的税收。

目前，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阶层变动中所涌现的新兴社会阶层是中